

编辑的故事

黄摇伊 轶著

金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编辑的故事 黄伊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05.12
ISBN 7-5656-0000-0

I ①编... II ②黄 III ③编辑 IV ④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23456号

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5 区 1 号楼 100021)

电话:(发行部)010-64263000(总编室)010-64263001

北京印刷厂印刷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16 开 100 千字

ISBN 7-5656-0000-0

印数: 1-1000 册

北京 100021 和平街 15 区 1 号楼

定价: 15.00 元

严师益友(代序)

王摇扶

我很幸运，当我刚刚迈入社会，加入编辑队伍的时候，便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好老师。黄伊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时候，被分配到第二编辑室也就是文学编辑室，学习怎样做编辑。当时萧也牧是编辑室副主任，是我的领导。黄伊则负责手把手地教我编辑的基本功，是我的第一个名符其实的老师。

初识黄伊的时候，他那种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的工作纪律是非常严格的，早愿时上班，晚远时下班，大家都自觉遵守，极少见到有人迟到早退的。黄伊则每天提前一个小时到办公室，拿上一份报纸站在大树下，开始大声朗读。黄伊是广西人，说不好普通话。他惟恐组稿、谈稿时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于是每天清早他就用普通话朗诵报纸来练习。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黄伊如此坚持数年，收效甚大。这虽是件小事，但当时给我这个懵懵懂懂的什么都没入门的女孩子确实震动很大，我感到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内心也非常紧张，我能当得了一个称职的编辑吗？

那时候，出版社有着严格的档案制度。例如编辑们写出去的每一封信件，都是抄件寄出，原件存档。一开始，我就干那抄信的工作。我发现，每封信都有一定的格式，最后总是“此致敬礼”，绝不会换个什么“祝好”、“新年快乐”、“安康”之类祝

福的话。抄了几几百封信以后，每抄到这里我就有点烦，于是就自作主张地将其改成五花八门的“祝福话”，心里还暗暗有些得意。不久，这事被我的老师黄伊发现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将这些被我改了“敬礼”的信重抄一遍。交给我时，他说：“规范有时代表着严肃、庄重。”看着他那一笔一画、整整齐齐的字迹，再看看我那歪七扭八的“大草”，真感到无地自容。从此我知道了，编辑对外是代表编辑部、代表出版社的，他的一言一行体现着编辑部和出版社的身份。像黄伊这样的老编辑尚且如此兢兢业业，我这个新手当然只有老老实实学习的份儿了，来不得半点虚假。

还有一次，大家一起去参观展览会。参观完了已是下午缘点，离下班约有一个小时的样子，我径直回了家。第二天才知道，其余的人却全部回到了办公室。我的老师黄伊非常严肃地找我谈话。他诚恳地说：“一个编辑的修养也是一个人的修养。要想当一个好编辑，就要一点一滴地严格要求自己。”可能，他从来不会想到，这短短的几句话真地影响了我这一辈子。每当我苟且要放松自己的时候，老师的教导就会在耳边响起，我就会振奋起来，努力起来。

我还永远记得黄伊老师如何教我去组稿。他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笨，如今的年轻编辑也许不会接受或根本不以为然。但当时对我这个“一穷二白”的女学生来说，却获益匪浅。

第一次黄伊老师带我去面见作家组编。他事先让我阅读和研究了该作家的作品。临行前，他对我说：“见了作家，你不要说话。你只要注意听我是怎样和作家谈话就行了。”于是，我很注意地倾听了他们长达一个小时的交谈。离开后，黄伊老师问我有何感想。我说：“看您谈得那么从容和您在作家心目中的威望，我才明白了这绝非是一日之功啊！说明您不仅对作家的创作非常熟悉，而且对文学现状也十分了解。”我在心中想，要想当个好编辑，就得向老师学习，要对作家和创作都能做到心中有数，了

如指掌才行。

第二次黄伊老师带我去面见作家组稿。他说由他主要和作家交谈，让我用插话的方式协助他谈话。这一次，我虽然说话不多，但还算得体。老师让我胆子再放大一些。

第三次，他就要求以我为主和作家交谈，他在一旁协助。我虽然很紧张，但在老师的不断鼓励下，我信心十足地上了阵，倒也从容不迫地完成了任务。这一次，他告诉我还需要多锻炼，千万不能自满。

三次以后，他就放手让我自个儿上阵了。

后来，我们一同调入《红旗飘飘》编辑室。《红旗飘飘》是一本发表革命回忆录为主的丛刊，比起书籍来组稿量更大，而作者又往往并非是作家，因此文字记录、整理、改写的工作十分繁重。那时的电话很不方便，不像现在私人电话、手机已很普遍。为了找到一个“知情人”的线索，有时黄伊老师带领着我，白天晚上地走大街钻胡同反复地去查找。他那种不辞辛劳，不怕麻烦，对编辑工作倾注了浓浓心血的开拓、奉献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在心中说：要做就做一个像黄伊老师那样，对事业充满热爱的编辑家！

“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先后离开了原来的出版社，我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人民文学杂志社，他到了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虽然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但黄伊老师却从未忘记帮助我。例如，当他编辑一套套书籍，编辑《科幻世界》丛刊时，都拉上我参加，使我不断地有机会和他共同工作，有幸从他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人常说，学无止境。黄伊老师就是个多面手。他不仅处理过长篇小说方面的书稿，也审读过传记文学、散文、故事、科幻小说、儿童文学、报告文学……同时，黄伊老师又是个作家。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中，尤其是在退休以后，他始终笔耕不辍，写出了不少的作品。

这部《编辑的故事》的出版问世，对黄伊、对我、对我们

这一代编辑、记者们，有着特别的意义和特别的纪念。

黄伊从不以我的老师自居，他只认为是我的朋友。但我认为，他是我永远的老师也是我永远的朋友——永远的严师和益友！

二〇一〇年 月于北京

一、“敬业和奉献摇摇摇 开拓与创新” 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

第一次辉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青年出版社草创时期，人手少，来稿也不多。有一天，编辑张永刚接到一部投稿，名为《奥斯特洛夫斯基传》。读了二三十页，书中的故事和描写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但稿中所写，却又似曾相识。再仔细读下去，他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怎么这位奥斯特洛夫斯基，不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么！想当年我和一些同学能从一个普通的青年走进革命的阵营，多亏那本《钢铁》。而眼前的这部《奥传》，主人公对革命的忠贞及与命运作抗争的精神，多么感人呵！原来作家本人总是站在生活的第一线，难怪他笔下的布琼尼的骑兵挥着马刀往前冲的气势，让你仿佛能听到那马刀的呼啸声；共青团员在风雪弥漫中抢修窄轨铁路的场面，写得那么震撼人心，原来都是作家的亲身经历。血管里流出的毕竟是鲜血呵！译者孙广英虽然不知名，译笔也还流畅。他想，稿子是可以采用的。张永刚将他的审读意见和他的一些想法，如实地向副总编辑李庚汇报。

李庚同志说，《钢铁》影响了一代读者，但是该书已经有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梅益同志的译本，我们就出版这本《奥传》，让小说里的保尔·柯察金和真实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一起鼓舞新中国的青年一代罢！至于译稿，因为我们社当时还没有俄文翻译，让张永刚将稿子送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请他们抽校一下。如果译

文忠实，就决定采用。

说办就办。张永刚将稿子送到联络部请人根据原文校阅若干章节。几天后，在得知译稿基本忠实于原文后，永刚马上去拜访译者孙广英。孙广英那时还在天坛医院住院。得知出版社准备采用他的译稿，精神为之一振。他出院以后，马不停蹄将译稿认真真校阅了一遍，在文字上作了许多润色。《奥传》于是在1956年正式出版。孙广英译的另一部译稿《奥斯特洛夫斯基演讲、书信、论文集》，也于1956年出版，仍由张永刚当责编。

那时，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对青年进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是当时青年团首要的任务之一。就在青年出版社出版《奥斯特洛夫斯基传》和《演讲集》前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正在紧锣密鼓地排练《保尔·柯察金》。青艺那时归团中央管。团中央的副书记廖承志同志还兼任青艺的院长。

《保尔》上演时，著名演员金山饰保尔，张瑞芳饰冬尼亚，刚从苏联回来的孙维世担任导演。采排时，廖承志陪着周总理来看。

戏是好戏，演员是名角，日理万机的总理又公开出面支持这次演出，戏还能不火吗！所有首都各大宣传媒体，特别是《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他们发表的评论文章和消息报道，一篇连着一篇，不但评《保尔·柯察金》，还同时推荐《奥传》和《讲演集》，说这两本书对了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它的作者如何重要。李庚同志也用“孟凡”做笔名发表文章，大讲新中国的青年为什么要学习保尔。“我们要像保尔·柯察金，要像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绝不让我们的大好年华虚度……”团中央系统的宣传媒体，当年用这样火一般的语言宣传鼓动和教育新中国的第一代读者。当时青年出版社在王府井南口，楼上是编辑部和办公的地方，楼下是书店，不远的地下室是印刷厂，来买《奥传》和《讲演集》的读者络绎不绝。

周总理叫他“小廖”，而我们称他为廖公的廖承志领导下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真是朝气蓬勃。《保尔·柯察金》演红了京城之后，在孙维世、吴雪这些艺术家的积极努力下，又准备推出另一场好戏《卓娅》。为了给青艺的演员在角色准备上作参考，剧院请中苏友协的人，将一本名为《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书作为资料摘要翻译出来，发给剧组的人，人手一册。

青年出版社这时增加了几位英、俄文的翻译。后来成了翻译家的陈斯庸（苏联小说《海鸥》的译者）告诉我说，他来出版社报到时副总编辑李庚跟他谈工作。那时正在抗美援朝，前方打得热火朝天，所以除了让他组织人翻译一些苏联共青团工作经验思想修养方面的读物以外，主要要抓介绍苏联国内战争及卫国战争时期一些英雄人物的书。编辑们都是一些耳聪目明的人，很快就知道青艺正在排演《卓娅》，而且打听出中苏友协的人已经将有关卓娅的资料翻译出来了。搞俄文的人，哪里有不知道卓娅的。于是他们找到友协的人，请他将该书的全文翻译出来，我们要出版单行本。稿子来了以后，陈斯庸将自己正在翻译的一部书稿暂时放在一边，专心一意为《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校阅，精益求精，直至发稿出书。顺便说一句，该书决定采用，译者曾署名“中苏友协译”，后来觉得，一本公开出版的传记故事，用单位的名字不大合适，所以改用“么洵”作译者名，此乃友协二字之谐音也！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出版和《卓娅》一剧的演出，在首都乃至全国的文艺界和青年读者中是一大盛事。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杨述同志告诉老编辑张永刚说：“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同志读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大加表扬，《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的长篇评论介绍《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乔木同意的。”

上面提到的杨述同志，我在这里要补上十分重要的一笔：团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向英雄学习，向保尔·柯察金、向卓娅学习，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是下了大力气的。他们用团中央的名

义，先后请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和卓娅舒拉的母亲来中国访问，向首都的青年作报告。有的学校开座谈会，有的开见面会。所有这些活动，青年报刊都作了跟踪报道。于是在北京的一些中学，组织了保尔班或卓娅班，将青年革命化的高潮，一浪又一浪地向前推进着。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青少年，如今有的两鬓染霜，有的已经成为爷爷奶奶了，但他们仍然没有忘记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如何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他们也没有忘记入团入党时自己曾经讲过的那些让自己的热血为之沸腾的誓言。因为他们是受过保尔卓娅影响的人呵……

我是在 1949 年代初离开中山大学的校门，走进青年出版社的。我亲眼目睹了我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青年团是共产党的助手。当时团中央所领导的直属部门，包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央团校、青年出版社，他们为了完成党交给的教育青年的任务，帮助涤荡国民党时期所遗留下的污泥浊水，转变他们在思想上所残存的不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各种错误思想，做新中国第一代的建设者和保家卫国的战士，他们对青年一代真是做了不少工作。

当时的团中央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化运动，建立青年一代的革命人生观，号召青年向保尔学习，向卓娅学习，向英雄们学习。

默默无闻的青年出版社，在富有开拓精神的副总编辑李庚的带领下，出版了《奥传》、《讲演集》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该书印数高达 100 万册），还有后来出版的《牛虻》、《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和《刘胡兰小传》等描写英雄人物的小说、故事，当然还有青年团的读物和思想修养方面的书籍，既教育影响了一代乃至两三代青少年读者，又使这家小小的青年出版社的名声鹊起，大放异彩，实现了第一次辉煌！

第二次辉煌

20世纪50年代初，团中央正在抓青年的革命化教育，要帮助全国青年树立革命人生观。由团中央宣传部牵头，组织人编写了一本《青年英雄的故事》，宣传介绍刘胡兰、董存瑞、王孝和、黄继光、罗盛教、丁佑君六位烈士的事迹。他们为了革命的胜利，有的牺牲在敌人的铡刀之下，有的舍身炸反动派的碉堡，有的在抗美援朝前线为了抢救朝鲜落水儿童，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了理想，为了信念，为了祖国美好的未来，革命青年不惜作出最大的牺牲。这本早期中青社所出版的《青年英雄的故事》，累计印数达150万册，给当时的青年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直属团中央的中青社，把出版正面宣扬英雄人物的读物，作为重中之重。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各方面的英雄人物层出不穷，中青社先后组织作家和记者，撰写了《向秀丽》、《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革命硬骨头麦贤德》、《一心为革命——王杰的英雄事迹和日记》、《焦裕禄在兰考》等人物故事。《雷锋》一书，印数达150万册，而《麦贤得》一书的印数，则高达100万册。这些书籍在青年读者中广为流行，读者可以想象得到，它对当时青年革命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中青社的编辑极富开拓性。为了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这时他们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创办《红旗飘飘》丛刊，发表和出版革命回忆录。他们组织那些身经百战的革命家和老战士，撰写他们九死一生的经历和丰富多彩的人生。革命前辈那些闪光的业绩和饱含着革命激情的文字，曾经感动了多少读过《红旗飘飘》的读者呵！他们除了办好这个丛刊，还编辑出版了许多单行本，如《共青团，我的母亲》（温济泽等著）、《在毛主席周围》（蒋秦峰著）、《在烈火中永生》（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著）和《王若飞在狱中》等。而《王若飞》的写作，得到了周恩来、董必武、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多次帮助和指点，该书印数高达猿园肆册，是革命回忆录中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和老一辈革命家相关的作品，我要把《革命烈士诗抄》摆到最显赫的位置。这部书的编成，人们当然要记上该书的主编、诗人萧三浓重的一笔；但书中许多激动人心、来自渣滓洞白公馆的烈士诗篇，却是罗广斌给我们提供的。而《诗抄》的责编是刘令蒙即诗人杜谷。该书的初步筛选、编排、必要的注释和说明等，大都出自刘令蒙之手。该书出版以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郭沫若等革命前辈，纷纷题词题诗赞扬本书。林伯渠同志的题诗虽只有短短的四句，却画龙点睛地点出了《诗抄》的主旨和价值：“谁敢动手换人间，非佛非仙非圣贤，五四以来新历史，光芒万丈此诗篇。”

现在我要写中青社的第二次辉煌中占有突出地位的所谓“三红一创”了。所谓“三红”，即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一创”即柳青的《创业史》。这几部小说的出版，有如下几个“本报内部消息”：一，每一部书稿的取得，都经过编辑们的不懈努力和锲而不舍的追求。除了编辑部热情洋溢的约稿信，专程拜访，社长朱语今还亲自到重庆去找罗广斌，这才约到《红岩》。《红日》是我们从电

影编剧沈默君那里得到的信息，向吴强要来的。二，这几部作品的作者，除了柳青，当时都不是名作家。我们看重这几本稿子，有这样两个原因：粤，题材重大。用现在的话说，是唱响主旋律；月，人物形象生动、鲜明、丰满。审稿的同志都十分看重朱老忠、贾湘农、江姐、刘思扬、梁生宝、梁三老汉这些人物的塑造。三，我们为隆重推出这几部小说，出版社不惜工本，请名画家作插图：《红旗谱》是写冀中高蠡农民运动的，画家黄胄的老家是蠡县，所以我们请他为《红旗谱》作插图；《红岩》写的是重庆歌乐山狱中斗争，所以请重庆的著名木刻家李少言、宋广训、吴凡等同志担纲，精心制作；《创业史》写的是终南山下蛤蟆滩的农民创业之路，所以我们请黄土高坡的画家蔡亮为该书作插图。

中青社编辑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红旗谱》、《红日》和《创业史》每种印数都在两百万册左右。而《红岩》的累计印数竟高达 苑园五册。这些作品，后来大都改编成电影、话剧、歌剧、广播剧、连环画，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小说连播节目里反复播讲。茅盾和周扬等文艺界的领导，好几次在文代会上，高度评价“三红一创”所取得的成就。

除了“三红一创”，中青社当时还出版了“二火”，即蒙古族作家乌兰巴干写的《草原烽火》，刘流写的《烈火金钢》。前者，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叶圣陶曾经亲自为它作序；后者，写的是冀中英勇的反扫荡斗争。小说出版 猿年后，电影厂将它改编成电影。该片所描写的日本军队的凶残和我抗日军民的英勇无畏，极大地震撼着当代青年观众，也给日本那些妄图矢口否认曾经侵略过中国的右翼势力一记响亮的耳光。

与此同时，在中青社的第二次辉煌中，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一部的出版，也赢得人们的高度重视。一是它质量上乘，后来又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二是该书在“四人帮”垮台后重版时，累计印数达到 圆园五册。该书在电台连播时，不但引起了

从少年儿童到普通市民的极大兴趣，连暂时赋闲，还未担上千斤重担的邓小平同志，都怀着极大的兴味读了《李自成》哩！

曾在中青社的第一次辉煌中作出过突出贡献的翻译组，此时又给亲爱的读者奉献了《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伏契克文集》、《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以及那常印不衰的《凡尔纳选集》等。正像我在本文开头所说，中青社直属团中央，是一个综合性的出版社，它还出版了许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知识性的读物，要在这篇短文里，将他们在五、六十年代四十多年的光荣业绩全都写出来是不可能的。到了改革开放知识经济的时代，科教兴国、素质教育，都提到了议事日程，中青社的出版工作值得广为宣扬的事还会少吗？



《革命烈士诗抄》插图

筚路蓝缕摇创业维艰

——中国青年出版社早期文学读物 出版活动的回忆

1956年缘月，我离开了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来到了北京，分配在青年团中央出版委员会工作。出版委员会是青年出版社的领导机关。出版社那时没有编辑部，我们出版委员会编审部便成了青年出版社的编辑部。1957年，根据当时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同志的建议，青年出版社与开明书店合并，组成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从二十世纪缘年代到苑年代，几十年来，我几乎一直在中青社工作。我们中青社不但出版了所谓五大文学名著——《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和《李自成》，以及其它一些脍炙人口的文学读物，而且出版了许多影响了一代青年的中外作品。我亲身经历了中青社编辑室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全过程。现在摘其要者勾画出来，看看解放初期那一代的编辑如何用他们的心血哺育一代读者，看看编辑们的情操和献身精神。他们当时的忘我精神，如今想来，与那个时代相比，还觉得毫无愧色。他们无负于时代，无负于时代给予他们的任务。编辑们都是些无名英雄，我却要替他们勾勒出几张速写。

摇摇主任的一声长叹

我刚到出版委员会时，与儿童文学作家贺宜、仇重、严大椿在一起，编少年儿童读物，先后出版了秦兆阳的《小燕子万里飞行记》、冯雪峰的《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魏巍的《志愿军叔叔和朝鲜小姑娘》、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以及苏联瑞特柯夫的《我看见了什么》等，工作差强人意。我参加工作不久，偶然碰见了一件事，这个场面我将要记一辈子——它促我奋进，使我时刻不敢忘记一个编辑的责任。我暗暗发誓，只要我当编辑，我一定不再让总编辑说这样的话，再发出这样的一声长叹！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青年出版社早期自己没有编辑部，那时我还没有到北京，也不知道委托谁编辑了一套《青年文艺丛书》。解放初期，不是发动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批判运动，拿萧也牧开刀么？也牧的作品，还有其他两个作家的作品，都收进了《青年文艺丛书》，接二连三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了，而且调门很高。风声紧，来势猛，青年出版社在社会上的名声弄得很狼狈，有点吃不消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某作家来信，要收回版权，他的作品不让“青年”印行了。那天，我正好到秘书科，看见一位干事把那封作家来信，交给出版委员会主任李庚，请示如何处理。李庚看完信，黑着脸，半天没有说话。后来，终于轻轻把信放到桌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他要把稿子抽走，就让他抽走吧，谁叫我们没有做好工作呢……”主任李庚当时所说的那个“吧”字和“呢”字，以及他长长叹息的那种口气，许多年来，一直存留在我的记忆里。它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我们卧薪尝胆，促使我们拼命地努力做好编辑工作！

摇摇从挫折中站立起来

1956年，团中央出版委员会的建制取消，原出版委员会的